



“跨界”馆长——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图书馆实践考述

□伍巧*

摘要 作为中国 20 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潘光旦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14 年。对其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梳理,既可窥探同时代“跨界”馆长们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缩影,亦可了解当时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概况。任职馆长期间,潘光旦在管理制度、馆藏文献资源建设、人才队伍、对外交流、图书馆服务等方面业绩斐然,体现了其珍爱书籍、化私为公和以人为本、关注读者的建设思想,也反映了其社会人文观、“位育”观与中西文化观等在图书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潘光旦 “跨界”馆长 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服务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3.014

人物向来是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现有研究更多着眼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或者于图书馆学有所著述的人物。本研究则将眼光投向非图书馆专业的图书馆馆长,也即专事于非图书馆相关职业,但兼任过图书馆负责人的“跨界”馆长,以期为完整呈现图书馆史添砖加瓦。在众多“跨界”馆长中,潘光旦(1899—1967)是任职时间相对较长且在日记中记录图书馆工作较多的一位,其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14 年(1938—1952),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对其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梳理,不仅可以呈现民国时期“跨界”馆长们在图书馆事业上奋斗的缩影,亦可管窥该阶段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样貌。

潘光旦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在优生学、社会学、民族学、性心理学、儒家社会思想、西方社会思想和翻译等方面,均作出突出贡献,是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关键人物之一。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1863—1915)是进士,曾创立多所学堂^[1];母亲沈恩佩出身书香世家,对书籍恪守敬畏之心^{[2](8)},书香家庭使得潘光旦受到了良好熏陶。在求学过程中,潘光旦常到清华学堂图书馆阅览线装书,后赴美留学时也经常去图书馆浏览图书。这些经历使潘光旦更加热爱与了解书籍,并获得一定的图书馆目录学知

识^[3],为其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同时,潘光旦兼任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与秘书长,对学校重要事务具有较高的参与度,对学生的培养需求有比较敏锐的关注,可更好地挖掘图书馆服务学校教学科研的功能,也为其开展图书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社会学家的潘光旦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其教育思想、家庭婚姻观、中华民族观、中西文化观等^[4],而对其馆长任职经历的挖掘,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潘光旦图传》^{[2](169-171)}、《清华大学百年图史》^[5]、《百年清华图书馆》^[6]三部著作均记述了潘先生任职清华大学图书馆期间,为战后图书馆恢复馆藏与运转所作之贡献;陈荣华^[7]、盛巽昌^[3]等则以读书、爱书为主线,撰文缕述潘光旦与图书馆的渊源;周余姣通过对潘光旦信函和日记的研究发掘,介绍了潘光旦在图书馆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与藏书思想,并借鉴其“位育”思想提出图书馆应立足于本职工作、与历史和环境相协调发展的两大启示^[8]。上述研究多侧重于潘光旦在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贡献,本文通过对潘光旦日记、信函的梳理,对清华大学图书馆相关史料的分析,旨在全面探索潘光旦图书馆实践业绩、实践思想,以实践

* 伍巧,ORCID:0000-0003-0803-9471,邮箱:13821860892@163.com。



观照潘光旦如何实现“跨界”融合,即其社会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反映,以期对潘光旦的研究以及图书馆史的研究略有补充。

1 潘光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

潘光旦的馆长任职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8—1946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时期,1938年,西南联大图书馆成立,袁同礼(1895—1965)、严文郁(1904—2005)、董明道(1902—1986)先后任馆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图书馆均改为校图书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运至昆明者,除一部分分存各研究所外,多数存本校各学系办公室,供本校师生之参考”^[9],潘光旦即任清华图书部主任。潘乃穆回忆道:“当时父亲兼职甚多,实际主持清华图书部日常工作的是唐贯方先生^{[10](88-89)}。”第二阶段为1946—1952年的恢复时期,潘光旦为补充馆藏、人员队伍扩大、组织调整等作出了辛勤努力。潘光旦是一位极为认真与负责任的学者,任职馆长期间,虽同时肩负教学、教务、研究等多项事务,但他经常去图书馆工作,常于午时前工作2—3小时,处理馆务事宜。

1.1 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办事效率

潘光旦对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建设与制度的建立十分重视。在图书馆管理方面,潘光旦在校务委员会上建议重组图书委员会,并拟定图书委员会章程,于1949年10月27日召开首次图书委员会,与委员们讨论了馆务与章程草案的问题。图书委员会的任务涉及六项主要工作:筹划、拟定总馆与各院系图书室的组织制度、管理政策与业务方针,计划及建议图书馆建筑重要设备及大宗图书的添置,编订图书馆公共图书概算,订立图书馆各项主要章则,经常检查图书馆工作情况,协助研究及推行改进计划^{[11](87)}。1949年11月9日,图书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图书委员会章程草案,并通过了学生的两点提议:一为图书委员会须加强馆务之领导与检讨馆务之进行;二为于委员会中推定一较小之工作会议,以执行此种领导与检讨之工作^{[12](140)}。在民国期间,图书委员会类似于一个位于校长与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经商议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沟通和协商的中介^[13]。清华大学图书委员会的成立加强了图书馆与师生、学校的沟通与联系,保障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各项事务的有序与合理运行。

在图书馆组织方面,潘光旦定期召开股主任会议,并举行馆员座谈会,内容主要涉及图书馆布局的调整、对图书馆管理的建议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办事效率。如在1947年9月17日召开的图书馆股主任会议中,将原有之期刊阅览室改为基本必读书阅览室^{[12](124)};1950年1月5日,将庶务工作渐与采录合并,以成总务^{[12](158)}。在行政方面,与学校秘书处与校长处商洽,图书馆在采购图书及其附带之装订等事项时,不用事先申请,这样减少了办事手续,提高了采访效率^{[12](89)}。

在图书馆服务方面,潘光旦组织修订了《图书阅览规则》《阅览室夜间及星期日值班办法》《指定参考书管理规则》《各学系图书室提借图书规则》等各项制度。其中《图书阅览规则》中对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借阅程序,教师与学生的借阅权限等作了明确的规定^{[14](524-527)},便于师生对图书馆服务的使用。

1.2 知人善任,关心员工

潘光旦为人亲和友善,在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知人善任,对员工关怀备至。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图书部工作人员较为缺乏,且变更较多,潘光旦多次致信梅贻琦校长,以补人事不足,如1939年5月15日,致信梅贻琦:“清大图书馆近有大批新书来到,亟待编目……查前本校图书馆职员张厚绚女士现赋闲家居,并请准即以该员充任,以资熟手^{[15](179)}。”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复员时期,潘光旦根据馆中事务扩大工作队伍,先后聘任沈家芬、尹宇萍、冯则忠、石运天、张企罗等人,负责图书部助理、编目等工作。潘光旦所聘任的这些馆员,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图书馆工作认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馆员黄延复在回忆中提到对一众馆员的印象:康精彩知识广博,业务水平相当高,可以与其探讨学术与校史相关问题,张企罗女士手抄卡片字迹工整漂亮且效率奇高,石运天先生虚怀若谷,操纵打字机的技术极为熟练^{[10](69-83)}。

同时,潘光旦注重按员工工资质和工作量拟定薪资,并视情况给予员工奖励。如1948年致信教务长霍秉权(1903—1988),因中文编目乙级组员康精彩、参考阅览书记赵玉书、期刊部书记吴人勉两年来甚著劳绩,拟请将三位馆员晋级,并酌予增加数额,以资奖进^{[15](207)}。除奖励外,潘光旦也给予员工以人文关怀,馆员尹宇萍生病需返家疗养时,潘光旦致信



教务长,言尹宇萍“平日工作勤慎,且好学深思,业余进修,所获心得,转而有助于馆中工作者”,希望准其从宽借支薪资^{[15](205)}。馆员们对潘光旦也十分敬重,在馆中从事中文编目工作的高贻玢(1903—?),因病辞职时,坚持把自己收藏的一批中国历代妇女著述赠送给他。潘光旦认为,这些书不应归自己所有,不妨共同继续积累,待有机会时编辑出版,以惠学林。后来这批书被赠予民族学院^[16]。

1.3 积极收购文献,恢复馆藏旧观

文献资源是图书馆建设的核心与灵魂。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北京,但图书馆的藏书已遭到严重破坏,潘光旦行动不便,且患有近视 1200 度的眼疾,仍为恢复馆藏四处奔走。在馆藏文献资源建设方面,他作了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处理西南联大时期图书的分配。据 1947 年 4 月清华大学图书馆统计,当时获得西南联大分书共 570 册^[17],同年 6 月,潘光旦与馆员唐贯方、毕树棠(1900—1983)前往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再次商量西南联大书籍的分配原则^{[12](94)},前后共分书 3 次。同时,收归存放于其他各单位的书籍。清华大学南迁后,部分图书在北平陷敌时被日军发交给伪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代科学图书馆、新民会、教育总署等敌伪机关分存,复校后,潘光旦与张子高(1886—1976)、朱自清(1898—1948)至敌伪产业处理局访朱良漪(1920—2008),获得伪北京大学与新民会单位的清单,收回了部分图书。另外,北平接收的敌伪图书,集中放在太庙,潘光旦曾参与图书分配会议,最终清华大学分得其中一部分,并派阮惟吾、贾迅两位馆员至太庙协助图书整理工作。据统计,清华大学图书馆自北平二十余所单位共收回图书中日文 135422 册,西文 42555 册,期刊 21575 册,共计 200552 册,此外零星集刊 16037 册尚未整理^{[14](521)}。

第二,收购名家藏书。1947 年 1 月 12 日,潘光旦开始接洽刘半农藏书一事,于 2 月 3 日与刘育伦(刘半农之子)商定,共收购 14000 册;1947 年 9 月,收购金松岑所遗藏书 15000 册,1948 年接收北平卢木斋图书馆赠书 23405 册(由于意外有部分损失),陶孟和赠书、拓片与碑帖共 8846 册等^[18]。潘光旦为收购名家藏书竭尽心力,除上述所提成功购藏外,

还有许多未竟之努力,如 1947 年请袁同礼设法介绍伦氏藏书,他认为伦氏藏书多至六万余册,集部最多且精,可弥补清华大学被毁之集部书籍^{[12](63)},但后被北平图书馆收购。

第三,进行日常采购。潘光旦制定了“以适用为主,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收买太贵的学生并不常用的专书”的购书原则^[19],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到阅书贾送来清样,以备采购,如某次阅书贾送来的家谱,有一本为明版桐乡吕氏谱,刻印甚精,但内容简略,索价亦昂,他认为图书馆若购入则“聊备一格,用处固有限”^{[12](96)},可见其采购书籍时认真考量过书籍的价格与用处。从 1946 年 10 月到 1947 年 3 月,图书馆共购进新书 30000 多册,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20]。

在潘光旦与馆员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至 1948 年 4 月已大体恢复至战前水平,拥有中日文书籍 219436 册(战前 216043 册)、西文书籍 92615 册(战前 64064 册)^{[10](88-89)}。1947 年 4 月 28 日,天津版《大公报》报道 4 月 27 日清华大学 36 周年校庆庆祝会说:“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双拐笑立礼堂前,谦谢恭贺^①。”

除藏书外,潘光旦亦努力收购文物,1946 年的图书馆附设有博物股,由沈家惠专事边疆文物整理工作^{[15](161-162)}。1948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成立文物陈列室,后另建立文物馆,常与图书馆保持联系与合作^{[11](555-559)}。潘光旦与文物考古学家陈梦家(1911—1966)为文物馆收购了不少文物,为清华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如 1949 年,潘光旦与陈梦家联系丁惠康(1904—1979)商量捐赠或贱让台湾高山族文物,丁先生认为清华大学在设备与人力上最为适宜,便将这批文物全部赠予清华大学,以便了解与研究高山族^{[11](562)}。这些文物后来放置于图书馆大理石厅分题展览,并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览。同年,他们得知胡厚宣(1911—1995)在南京、上海获得 1000 片甲骨,特赴上海与胡先生商量,最后获得了这批甲骨^[21]。

1.4 营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潘光旦重视教育,对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更加注重。在当时的学校,亦有考试周图书馆拥挤的情形,

① 《大公报(天津)》,1947-04-28,转引自吕浩.潘光旦图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60.



当时电灯经常发生故障,夜间秩序不易维持,潘光旦与馆员商定四项补救办法:一为添置汽油灯,二为催理工学系在各专馆开阅览室,三为延长阅览时间,四为增加人员^{[12](63)}。第三项在当天商定后便立即实施,图书馆每天早8点开馆,延长至晚10点闭馆,一直连续开放。之后图书馆又增辟阅览室,安排目录柜,开放中文期刊,竭力改进服务,满足师生需求。曾在图书馆学习的清华学子回忆道:“老图书馆的阅览室,特别是第三阅览室比较大,可容纳300多名读者……阅览室的灯光好,大圈椅久坐不易疲劳……这样的环境气氛和条件成为吸引同学们向往到图书馆来的因素^{[10](20-22)}。”良好的学习环境,用心的服务照顾,使得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为莘莘学子的学习乐园与经年后的美好回忆。

潘光旦注重学生对图书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多次为学生作“图书与阅读”等指导报告^[22]。同时也关注学生们的借书读书情况,学者资中筠曾回忆“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10](130-138)},潘光旦重点指出学生不爱看文言与外文书籍,担忧学生不读要动脑筋的书。作为一个馆长,潘光旦不仅关心读者的阅读环境,还关心读者的阅读情况,对学生有读书方面的期待,这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情怀。

1.5 发展对外交流,展示图书馆风采

1946年之后,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为学校里受人瞩目的中心,经常作为清华大学的重要接待参观场所,接待重要领导人、国外访问团和国内的同人等,时为馆长的潘光旦自然负责接待这项任务。其任职期间的接待安排详见表1。

图书馆运营的质量好坏是高校竞争力的表现之一。清华大学图书馆从发展之初,在馆舍、制度、馆藏等各方面在国内均首屈一指。复原后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亦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值得业界同人学习。同时,潘光旦也十分注重与图书馆专业人士的交往,如前文所提及之董明道、袁同礼(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馆长)等。清华大学图书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华大学及其图书馆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与认可;对于国外来访者的接待,一方面说明了清华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实力,如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教授参观后,赞誉“图书

表1 潘光旦任职期间接待安排

时间	接待人物	接待人物所属单位或职务
1947年3月17日	董明道	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1947年5月1日	乔治·卡特林 (George Catlin)	英国工党议员,教授
1947年5月8日	尼泊尔访问团	
1947年6月4日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等	中英文化合作委员会
1947年7月2日	哈里斯 (Harris)	美国新闻处
1947年8月8日	伍德布里奇· 宾汉姆 (Woodbridge Bingham)	加州大学教授
1949年10月3日	陈毅	党和国家领导人
1949年10月10日	丁惠康	医学专家

资料来源:据《潘光旦日记》整理。

馆之建筑、布置、藏书,在英国亦不数遭^{[12](82)}。潘光旦在发展对外交流中履行了其作为馆长的本职工作,与馆员们共同打造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良好形象。

2 “跨界”融合的图书馆实践思想

周余姣认为潘光旦取得的图书馆管理成就与其采购图书的藏书思想有关,潘光旦不仅对图书馆藏书有着自己的关切之情,对整个中国旧书业也保有极大的责任感^[8]。这是其热爱图书的表现,除此之外,潘光旦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与其自身的社会学、教育学、中西文化观等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2.1 珍爱书籍,化私为公

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伴随着私家藏书或出售或捐赠的化私为公的浪潮,潘光旦也成为这一文化自觉的实践者。潘光旦是懂书、爱书的藏书家,他认为私人藏书难以维持,要想免于散失,唯一的途径就是转移到公共图书馆,送赠售卖,以整批转移为原则^{[23](220-228)},并发出“救救书籍”的呼吁,不希望旧书全部变成分量相等的大批白纸^{[23](229-23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潘光旦注意打听各藏书家留存藏书之消息,根据馆内所缺图书类型联系购买,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购进不少古籍珍本。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潘光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虽不担任图书馆职务,仍为该院图书馆联系促成了多批图书捐



赠,如陈宗亮、张涛卿之遗书及苏州文管会之藏书等^[10](88-89)。

2.2 以人为本,关注读者

作为社会学家的潘光旦看问题的视角是一直在变化的,到了抗战结束以后的复员时期,其常从人文思想的视角看待问题,把人本身作为关注的对象,这种思想的变化也影响了其作为图书馆馆长的关注点——以人为本。这种关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员工的关心,视员工之擅长分配适当的工作,关注员工的薪资,给予适度的方便;二是对读者的关心,他常常以馆长的角度观察图书馆的服务与读者的需求,不仅提出“举凡教授同学见有新书,都可向图书馆建议,图书馆一定购买”的购书制度^[19],还常常通过会议与聊天的方式征集学生们对图书馆的建议,进而分析图书馆服务不到位及工作需要改进之处,及时提出措施以使服务落地,前述之开放时间、馆内空间的布局调整等均有所体现。

2.3 图书馆教育功用的挖掘

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学界见仁见智,通常认为“位育”是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潘光旦对“位育”的解释为“安所遂生,是为位育”,任何人和事物要“安所遂生”,首先要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24]。这种“位育”思想体现到图书馆的工作实践中,则是图书馆与学校、师生的统一,即对图书馆正确的定位。纵观潘光旦以往的著述发现,他虽未曾直接言明高校图书馆的重要性,但着重强调了图书馆藏书、借阅、服务的重要性,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图书馆的定位,即提供书籍服务的知识场所。体现在其行为上,则是注重挖掘图书馆辅助教育的功能。1952年,时为大学一年级新生的建筑学家关肇邨参加迎新会后认为,印象最深的当推充满活力的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和站在台上一动不动的图书馆馆长潘光旦教授。待他们讲完话后,会让人迫不及待地想去参加体育锻炼和到图书馆看书^[10](23-26)。这不仅体现了潘光旦的个人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潘光旦在学生面前对图书馆作用的肯定。无论是对书籍的悉心采购,还是对青年学生读书情况的观察,以及各种规则制度的修订,都体现了潘光旦对图书馆教育功用的看重,希望图书馆可以满足师生需求,使大学图书馆作为服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中心。

2.4 中西文化观下的“阅读指导”

潘光旦认为,青年对于旧日的文物,也就是对民族生命所寄的文化,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他提倡对中国固有的文化采取选择性吸收,使中国青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能够坚持民族本位,有所融合创造^[4](262)。正是这种中西文化观,使得潘光旦在采购书籍时,汇集万象,穷究百家,注重实用且全面的收藏。从其为图书馆收藏图书的类型与数量来看,古今中外凡对学生有用者不论版本均收入馆中,以使学生全面地接触到中西文化。同时,在发现“青年人爱读新书,不爱读旧书,爱读洋装白话文之书,不爱读线装文言文之书,爱好讨论现实问题与宣传当代思想的,而不爱读关于人格修养、文化演变、比较通盘而基本的书”时^[25],潘光旦不仅撰文论述阅读经典书籍的重要性,还在演讲中指出这一现象,并作阅读指导报告,引导学生阅读。

3 结语

从上述潘光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理念来看,仍有可资今人借鉴或持续关注的地方。

第一,潘光旦聘任的馆员都具有认真的态度与较强的业务能力,如今的图书馆也应根据业务需求招聘能够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的员工。第二,潘光旦注重古籍文献的保护与收藏,对于今天的古籍来说,更急迫的任务是保护与开发,尤其是在保护技术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做好古籍的利用。第三,潘光旦常根据读者需求改进图书馆的空间布局为读者提供服务。当前,读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图书馆也应提供多样化的空间服务,吸引师生到馆。第四,清华大学图书馆作为当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与示范作用的图书馆,积极发展对外交流,展示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特色。在国际化的趋势下,大学图书馆应多方位开展文化交流,与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建立合作关系,打造高校图书馆文化名片,建立跨文化交流阵地。第五,潘光旦认为“读书的不自由,来自外来的禁止与内发的忌讳。外来的限制或禁止如图书的缺乏,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发的限制或忌讳,即青年人的成见”^[25]。对此,高校图书馆应建设文献保障措施,创新馆藏评价体系,为不同类型院校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提供信息支撑^[26],并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时多加引导,在“全民阅读”文教国策的倡导下,落实分众阅读、分类阅读、分级阅读、分地阅读、分时



读物等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实践,以提高大学生的阅读质量,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作贡献^[27]。

潘光旦是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打通文理的社会学家,也是兢兢业业的教育家。虽然他的图书馆实践经历只是人生履历中不起眼的碎片,但为清华学子和如今的图书馆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入学清华大学的第二年(1915年),潘光旦因意外不得不终身架着双拐行走,他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其因腿疼而不得不推辞一些事情,但他的韧性与认真促使他履行了学术、行政、馆长等各项职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家与人生榜样。程焕文将图书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28],潘光旦正是具备这种精神的代表,他的精神,他的眼光,他的成果,都是世界性的,当缅怀之,深思之,学习之。就学术研究而言,图书馆史的研究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非图书馆学的人才多集中于实践层面的工作,后续研究不妨将视野拓展至非图书馆专业馆长的实践史,探索“跨界”馆长的工作业绩与办馆思想,以全面呈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的风貌。

参考文献

- 1 熊月之.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0.
- 2 吕文浩.潘光旦图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3 盛巽昌.潘光旦:卓越的学术大师,认真的图书馆长[J].出版人:图书馆与阅读,2009(1):1-3.
- 4 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 5 韦庆媛,邓景康.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 6 《百年清华图书馆》编写委员会.百年清华图书馆百年校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 7 陈荣华.学术大师潘光旦的图书馆情结[J].兰台世界,2012(22):

- 15-16.
- 8 周余姣.寻求图书馆的“位育”之道——潘光旦图书馆实践及启示[J].公共图书馆,2010(1):67.
- 9 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286-290.
- 10 侯竹筠,韦庆媛.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11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1948年12月至1952年10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12 潘光旦.潘光旦日记[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 13 王晓军,陈华.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行政地位相关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3(4):10-18.
- 1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4卷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46-1948[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15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9.
- 16 张冠生.潘光旦逸事[M]//张冠生.晴耕雨读(增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198-208.
- 17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21(1-2):6-7.
- 18 刘蔷.清华园里读旧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9 张远.介绍清华:大图书馆[J].清华周刊,1947(5):4.
- 20 宋立志.名人与名校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58.
- 21 胡厚宣.人生漫漫为“甲骨”[M]//余子道.曦园星光 史苑流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283-294.
- 22 张喜梅.馆里馆外 文化名人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建和理论探索[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116.
- 23 潘光旦.守住灵魂的底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 24 潘光旦.忘本的教育[M]//潘光旦.直道待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47.
- 25 潘光旦.读书的不自由[J].观察,1948,5(16):4-5.
- 26 高冰洁,姚晓霞.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的发展方向[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4):33-40.
- 27 徐雁.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图书馆阅读推广——打造“三位一体”全民阅读推广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J].图书馆研究,2019,49(1):9-15.
- 28 程焕文.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2):35-42,9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4日

修回日期:2023年2月11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Crossover” Curator: the Library Practice of Sociologist Pan Guangdan

Wu Qiao

Abstract: Pan Guangdan is a famous sociologist, anthropologist and educator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and served as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14 years. By combing his library practice, we can not only provide a glimpse of the contribution of contemporary “cross-border” librarians to the library cause,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t that time. During his tenure as curator, Pan Guangdan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talent team development, foreign exchange, library services, etc., which reflected his ideas of cherishing books, making private work for the public, people-oriented,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readers, and also reflected the guiding role of his social humanistic view and “Wei-yu” view,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view in library practice.

Keywords: Pan Guangdan; “Cross-border” Library Director; Library Construction; Library Service